



西方妇女史

裔昭印 等著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47.

西方妇女史

裔昭印 等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D445.09
Y5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妇女史/裔昭印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7-100-06674-7

I. 西… II. 裔… III. 妇女史学—西方国家 IV. D4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271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西方妇女史

裔昭印 等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674-7

2009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7½

定价: 74.00 元

序 言

在传统史学中,男性一直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央,而广大妇女则被遗忘,成了历史叙述的“失语者”。这不但造成了历史研究题材的狭窄,也导致人们对历史认识的偏差和失误。

人类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强和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史学家的视野不断开阔,研究的领域空前扩大。社会史、家庭史、妇女史、心态史、风俗史、灾荒史等众多领域被开拓出来,以往历史隐蔽着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私人生活、民众心态和性别关系等方面的变迁亦被揭示出来,重构的历史画面变得愈益丰富多彩。与此同时,欧美妇女运动空前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起,妇女史研究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它以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史学的内容,也为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重要的历史问题,从而对当代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在史学变革中兴起的新兴学术领域,妇女史十分注意吸取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新史学、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学派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对象方面,它把目光对准了全体妇女,在继续研究知名妇女和上层妇女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城市和乡村普通妇女的研究。在研究的途径方面,它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或者简单地把妇女的历史活动填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历史中的做法发展到结合男性状况和两性关系来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范围方面,它从研究妇女的政治、经济活动、家庭婚姻进一步扩展到她们的宗教、文化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研究的分析范畴方面,妇女史最重要成就之一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并把它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

“社会性别”(gender)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它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1972 年,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出版了《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一书,论证了生理上的性别(sex)与心理和文化上的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差

异。^① 1975年,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发表了《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一文,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性别制度是导致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1976年,美国历史学家琼·凯利发表了《性别的社会关系》一文,主张把社会性别看作如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一种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② 1986年,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在其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中指出,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它成为表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表明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③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了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历史经验的差别和妇女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两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别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总的说来,社会性别概念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它引起了历史学家,尤其是妇女史学家的重视,促使他们去探索隐藏在社会制度之中的两性关系,撰写包括男女两性历史经验在内的全新的人类发展史。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妇女史的研究。例如,1855年,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出版的《大革命的妇女》,讲述了法国大革命中妇女的活动与状况。^④ 1931年,美国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比尔德撰写的《理解妇女》一书付印出版;1946年,她又发表了其名著《作为历史中一种力量的妇女》。^⑤ 比尔德在这两本书中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探讨了女性在历史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分析了法律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当时,妇女史著作的出现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密切相关。不过,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仍然受到了传统史学的较大束缚。妇女史兴盛近三四十年以来,涌现的著述数以万计,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方法、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就通史性的西方妇女史著作而言,国外史学界取得了不少成果。美国学者安德森和津泽的两卷本著作《她们自己的历史》(1988年)以专题的形式描述了西方妇女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妇女社会角色的发展

① Ann Oakley, *Sex, Gender and Society*, Maurice Temple Smith Ltd., London, 1972.

②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5, pp. 157-210; Joan Kelly-Gadol, "The Social Relation of Sex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 of Women's History", *Signs*, 1:4 (1976), pp. 809-823; 这两篇论文的中译本可参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21—100页。

③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5 (Dec., 1986), pp. 1053-1075.

④ Jules Michelet, *Les Femmes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Adolphe Delahays, 1855.

⑤ Mary R. Beard, *On Understanding Women*, New York, 1931; Mary R. Beard, *Women as Force in History*, Collier Books, New York, 1946.

和变化。^① 由法国学者乔治·杜比和迈克尔·佩洛特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著作《西方妇女史》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西方女性的历史活动经验,论述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方式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组织过程。^② 美国历史学家布里登特尔等人主编的《变得可见:欧洲历史上的妇女》从1977年起先后出了三版,其中第三版从社会性别、阶级、劳作、法律、文化、宗教等方面对欧洲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该书吸取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变化与流动对妇女的作用以及各国妇女运动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对妇女的性特征及其象征意义作了描述与分析。^③ 此外,美国学者莉莎·卡普里奥和梅丽·维斯娜编纂的史料集《生活与声音》搜集了从古代到当代有关欧洲妇女历史的重要资料,也为人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④

国内对于西方妇女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90年代,兴盛于本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高校中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恢复和史学革新的深入发展,国内史学界开始关注西方妇女史的研究,《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刊登的这方面论文逐渐增加,研究性的著作在艰苦探索的基础上脱颖而出。^⑤ 由于受到资料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国内对于西方妇女通史的研究状况不尽如人意。除了两本介绍性的书籍——李平的《世界妇女史》(1993年)和李雪季主编的《世界女性历程图说》(1999年)外,尚无总体的西方妇女史研究专著出版。正因为如此,国家社科基金评

① Bonnie S. Anderson and Judith P. Zinsser, *A History of Their Own: Women in Europ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2 vols., New York, 1988.

② 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 gen. eds.,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5 vol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4.

③ Renate Bridenthal, Susan Mosher Stuard and Merry E. Wiesner,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3rd ed.,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8.

④ Lisa DiCaprio and Merry E. Wiesner, *Lives and Voices: Sources in European Women's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

⑤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妇女史的著作主要有:闵冬潮的《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马嫒的《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王政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裔昭印的《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刘文明的《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与《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陆伟芳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潘迎华的《19世纪英国现代化与女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贺璋璐的《神光下的西方女性》(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和王超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等。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对西方妇女的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端木美、周以光、张丽合著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妇女·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邢来顺的《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薄洁萍的《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学林出版社2005年)、晏绍祥的《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裔昭印、苏振兴、路光辉的《古希腊人的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和黄虚锋的《美国南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研究:1877—192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也以一定的篇幅探讨了有关妇女与性别的问题。

审组的专家们对我们申请的《西方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的课题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专家们的支持激励着本书的作者们在吸取国外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来研究西方妇女史,并从妇女和性别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本书共分十章。主要内容为从爱琴文明至今的西方妇女发展史,具体包括古代希腊和罗马、中古时代、转型时期、近现代西方各主要国家的不同阶层女性的经济、政治、法律、工作、宗教、家庭婚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状况。在本书中,我们一方面从纵向的角度对西方妇女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角度对涉及女性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探讨,以期达到对西方妇女史的整体把握与理解。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爱琴文明时期妇女的地位较高。自荷马时代开始,西方男女两性关系逐渐从伙伴式的合作关系让位于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不平等关系。这一现象在古风时代日益明显,并在古典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在古典时期达到鼎盛的雅典民主政治的确激发了公民的积极性,促进了雅典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之成为全希腊的学校。然而,从妇女史和性别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人们不难发现,雅典民主政治仅仅只是占雅典人口少数的男性公民的民主,它把广大妇女、外邦人和奴隶排除在外,而且为了消除男性公民之间的纷争,缓和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民主政府加强了对妇女的控制和对公民妻子的幽禁,从而使雅典妇女的地位比先前时代更为降低。当然,不同城邦的女性略有不同,如古代斯巴达女性要比雅典女性享有较多的自由,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较高。

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女性的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希腊化时代,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婚姻,还是在受教育方面,希腊化时代的女性所享有的权利都超过了此前的时代。在罗马时代,尽管罗马人建立和发展了古代历史上颇为强大、严格和完备的父权家长制度,女性作为男性家长的财产和附属品的地位从来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但与希腊妇女相比,罗马的女性有着较多的自由和权利。她们不仅在家庭生活中独当一面,而且还走出家门,出现在战场、市政厅、手工业作坊和她们的异国姊妹所不能涉足的公共场所中,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享受着她们的异国姊妹很少享有的权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历史上,是罗马妇女第一次意识到了属于自己的性别权利,并付诸行动,向男权至上的观念挑战。

与古代相比,中世纪西方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未发生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该时期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然,这与中世纪西方社会文化的变迁是一致的。

在中世纪时代的早期(公元5—10世纪),一种新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结构得以形成。

它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并融合日耳曼、罗马因素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对女性的观念建构也随之而来。强调女性从属于男性,并应顺从男性,应保持贞洁等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得到重新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所应遵守的各种规范也逐步建立起来。对女性的歧视和压制这种传统的性别关系也成为整个中世纪西方社会的主流。

至中世纪盛期(公元11—13世纪),尽管传统的性别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该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古典文化的回归和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性别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首先,出现了一种强调尊重女性,强调两性平等的思想。在天主教思想界,一些教会人士开始反省传统的神学理论,强调亚当也应当对原罪负责。有的教士甚至认为,女性不仅与男性是平等的,甚至还要优越于男性。同时,在该时期,圣母崇拜也兴盛起来,反映出人们对女性心态的一种变化。在世俗社会中,许多文人学者开始歌颂和赞美女性,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行吟诗人所歌颂和传播的典雅之爱。其次,女性(主要是贵族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作用增强,其社会和法律地位有所提高,这与贵族骑士大批地参与十字军东征有关。再次,女性的社会作用得到凸现。贵族女性自不待言,而城市和农村的普通女性也积极参与到了社会性劳动之中,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女性还推动了该时期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总体看来,在中世纪盛期,西方的两性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与前期相比,西方女性在该时期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其作用也有所增强。当然,在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的女性,其社会地位、政治和法律权利、家庭和婚姻、受教育的程度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14—18世纪是西方近代化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使欧洲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技革命等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性事件,欧洲人产生了以人为本、自由、平等的近代思想,西方文化开始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在社会转型时期,西方女性在法律上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其财产权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承认;她们活跃在不同的劳动领域中,少数上层女性还接受了较高度的人文主义教育。然而,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恶性事件,如猎巫运动等。可见,西方社会的转型并非像以前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着美好与希望,同时也有一些不和谐之音。

与西方社会转型相适应,社会性别关系的重构当然也在所难免。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该时期对两性关系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弱化或打破旧有的男权社会,而是对之进行了重新的确证,其目的是使男性能够全面地控制女性,使她们沿着男性设计的道路前行,由此也就导致了劳伦·斯通所谓的“父权制的强化”之情况的出现。在这种形势

下,那种强调女性贞洁、缄默、温顺的传统女性观不仅得以重新流行,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事实上,当时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和新教改革家仍然固守传统的性别观念。在宗教改革期间,尽管基督教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在宗教思想上针锋相对,但他们在歧视女性的态度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这个时期,在社会经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通过各种途径,设法将女性从不同行业和行会中排斥出去或者对之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女性行为规范的控制。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西方女性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得到什么改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退步和下降,社会转型给男性而不是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乃至暴风骤雨式的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成为西方步入近代的标志性事件。虽然这些激荡整个社会的巨大政治和思想变革,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性调整,为女性冲破传统的家庭私生活樊篱,参与政治公共领域事务提供了机遇,事实也表明众多女性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并且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政治革命激起的浪花也并未动摇传统的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在革命过程中和结束后产生的法律和法规仍然将妇女的平等权利排除在外。在启蒙运动时期,不少启蒙思想家仍然把女性看作是低于男性的二等公民。由此可见,西方妇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现实地位和观念形象,是一种超稳定的长时段结构,难以为短暂的政治思想革命所彻底撼动。

18世纪60年代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既是一场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生活面貌的变革,也为两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此期间,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变革潮流里的人类“另一半”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的沉浮变化:中产阶级妇女从社会生产和劳动领域离开,成为囿限在家庭天地里的“家庭天使”;而广大的下层妇女为了弥补家庭生计的不足,或受雇于工厂、农庄充当产业工人,或进入富裕家庭做女佣。工业革命尽管为广大劳动阶层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并没有对她们的社会和家庭地位的变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意识,随之各国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和社会改革风起云涌。在这股民主化的浪潮中,女权主义思潮也开始萌发。一些女权主义者著书立说,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至19世纪中期,终于引发了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女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不仅向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宣战,争取提高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也是对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一次扫荡。

正是在时代变革赋予的机遇下,西方妇女凭借自己的斗争,力争教育的男女平权,获取工作自由、拥有财产以及诸多其他社会政治权利,并将目标直指一种体现男女平等的重

要权利——选举权。西方女性的地位和她们的自我意识终于在工业革命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与妇女社会地位紧密相联的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则变化甚小,男权力图将之规约在家庭的狭隘领地。直到19世纪后期,这种情况仍未有多大程度的改观。

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震荡。相继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妇女的生存状况。由于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妇女在家庭和社会担负起更为重要的角色。战时劳动力的缺乏所导致的就业真空,使得广大妇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生产第一线,进入昔日为男性所垄断的一些就业领域。而妇女在战争时期的出色表现,也为自身赢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乃至赞许,从而促使其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但战争并未彻底瓦解男权主导下的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随着战后“常态”的恢复,西方社会对作为“弱者”和“他者”的妇女的偏见与歧视依旧。不过,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促使两性关系朝着平等的终极目标逐渐迈进。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赋予妇女以平等的选举权。女子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就业特别是已婚妇女就业呈上升趋势,而且逐渐形成一个女性白领职业阶层。更为重要的是,20年代的美国和西欧社会还造就了一种以青春、健康、时尚、反传统的面貌出现的“新女性”,她们受教育的程度高,有自己的职业,婚姻观也与老辈有别,追求经济独立、职业发展和婚姻家庭的完美结合。毫无疑问,“新女性”的形成离不开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性革命思潮的影响和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但也是女性在向传统的男权文化进行挑战过程中的一次自我张扬。

就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分水岭。而从妇女社会角色方面来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引起的社会政治变迁,同样意义非凡。正是由于二战的剧烈冲击,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有所提高。然而,妇女解放长路漫漫。客观存在的两性生理差异,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占主流地位的父权文化的制约等等,使得女性赢得真正解放、获得真正平等的美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于是,在经历了二战后初期的沉寂之后,一场新的女权运动在60、70年代席卷欧美。

20世纪中叶以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兴起,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和进程大大加速,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面貌发生新的巨大改观。受其影响,西方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就业水平、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秉承福利国家政策的西方各国政府,给予了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以更多的关怀,通过广泛的社会立法进一步改善了妇女的社会法律地位。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日趋开放多元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西方妇女的婚姻观、家庭观、性别观、权利观等等也呈现出新的动向。然而,在当代西方妇女积极跻身政坛和越来越多地投身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同时,“妇女问题”迄今仍是困扰当代

西方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一方面,广大的女性群体对于男权制度文化主宰下的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对女性的显性和隐性歧视极端诟病;另一方面,对于女性“解放”和“权利”诉求的途径、内涵及其尺度等等,不仅作为一个群体的广大女性本身难以达成共识,而且男性社会也存在诸多认识上的分歧。于是,有关妇女的一系列问题及其改进措施,大至男女平权和性别歧视,小至家庭暴力和生育权,无不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史实说明,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走向现代的历程相比,人的观念,尤其是性别观念的现代化需要更长的时间,男女事实上的平等的实现和两性伙伴关系的确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书是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妇女通史研究的初次尝试,是10多名学者花了在整整7年的时间里通力合作、潜心研究的结晶。在资料的运用方面,我们既注重对原始资料的发掘和解读,也注重对现代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利用。具体而言,我们所运用的原始资料包括各个历史时代作家们的相关著作、公私档案、法律文件、宗教文件以及相关的文学与图像资料等等。在研究近现代英美、法国和德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妇女史时,我们也尽量利用了相关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等文献资料。为此,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搜集与整理国内现有的资料,并从国外购买了许多相关的书籍。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吸取西方学者在妇女与性别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努力把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前沿性结合起来,并力图通过对丰富翔实的史料的梳理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广泛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女性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西方妇女史,在宏观的背景下,对个案做深入细致的分析。本书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从文化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阐述与分析妇女境况和两性关系的变迁。我们认为,妇女的地位和性别差异主要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范畴,也就是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宗教、语言、社会制度、人们的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例如,我们从分析古罗马社会的家长制特征着手,阐述了罗马妇女的宗教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世纪西方典雅之爱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对这种带有文学景观的爱情观念的社会意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而得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第二,在借鉴西方学者有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深入研究了家庭劳动与社会性劳动之区分对于女性地位的影响与作用。在对古希腊、文艺复兴和近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妇女进行研究时,我们分别从公共生活和家庭私人生活等不同领域和活动空间对她们的地位进行了探讨。第三,在考察西方妇女总体状况时,也注意到了她们之间的差异,并尽力关注下层女性。针对西方妇女史和社会性别研究中有时出现的将妇女地位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我们在研究中注意探讨西方妇女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以

及不同领域中地位的差异,并对不同妇女群体分别进行研究。例如,我们对围绕雅典男性的不同类型的女性、对中世纪的贵族妇女、修女、寡妇和工业革命时期的中产阶级妇女与女工等不同群体与阶层的妇女分别进行了研究。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对女奴、妓女、女佣、女巫、女工等西方社会历史上的下层和边缘女性的状况进行了考察。第四,在研究的领域方面也有所拓展。例如,我们对以往国内妇女史研究基本未涉及的女性身体观、女同性恋、女巫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从而丰富了妇女史研究的内容。第五,从妇女史角度的探索,使我们注意到不少被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忽略的问题,并展开了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反思。我们的研究表明,雅典民主政治有其局限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它的发展是以牺牲妇女的利益为代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的发现主要是对男性价值的肯定,倡导宗教改革的新教教徒的妇女观与天主教教徒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些宣传“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家依然歧视女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等级制度,却没有触及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妇女的状况告诉人们,妇女的地位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同步提高。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我们修正对于重要历史问题和历史分期的看法,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认识到全面实现人与道德伦理规范现代化的艰巨性。总之,探讨历史问题不能忽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历史经验,历史学家应当用男女两性的双重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的过去。

对整个西方妇女史作梳理绝非易事,本书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在对古希腊城邦妇女进行研究时,我们的资料主要局限于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城邦。又如,尽管我们注意到对下层女性的研究,限于历史上对这些人的记载十分有限,我们对她们的探讨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真诚地希望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广泛地听取意见,以把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行下去。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古代希腊的女性	1
一、爱琴文明时代的女性	3
二、荷马时代的女性	6
三、古风时代的诗人与女性	13
四、古典时代的女性	19
五、希腊化时代妇女地位的变化	52
六、古希腊妇女与宗教	63
第二章 古代罗马的女性	74
一、父权家长制统治下的罗马女性	75
二、早期罗马妇女与传统的女性观	87
三、从共和到帝制转变过程中的妇女解放运动	102
四、古罗马妇女与宗教	118
第三章 中世纪的西方女性	137
一、中世纪西方人的女性观	138
二、婚姻与家庭中的女性	160
三、普通劳动女性的日常劳作	169
四、女性的政治权利与教育状况	200
五、女性的宗教生活	208
第四章 近代西方社会转型中的女性	218
一、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西方女性	219
二、宗教改革中的西方女性	238
三、猎巫运动对女性的迫害	249
第五章 近代政治革命中的女性	272
一、英国革命时期女性的参与	273

2 西方妇女史

二、美国革命与妇女	279
三、法国启蒙时代的女性形象与角色	289
四、法国大革命与妇女境遇	304
第六章 工业化时期的西方女性	323
一、英法妇女在工业化中的命运变迁	323
二、工业化时期德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351
三、美国工业化与女性生活状况	364
第七章 近代家庭性别关系和第一次女权运动	383
一、近代家庭中的性别关系	383
二、西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398
三、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目标和成果	405
第八章 20 世纪上半期的西方妇女	423
一、20 世纪初西方妇女的状况	424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妇女	428
三、两次大战之间的西方妇女	433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妇女	450
第九章 战后女性风貌与女权运动的新高涨	458
一、战后初期女性角色的转换	458
二、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兴起	469
三、欧美女性的参政运动	481
第十章 当代西方女性的困惑与探索	507
一、妇女的社会经济处境	508
二、依然存在的性别歧视	516
三、妇女解放,路在何方?	523
四、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探索	533
参考文献	556
后 记	583

第一章 古代希腊的女性

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其思想遗产构成了现代西方精神文明成果的重要基础。同样,古希腊女性史也是西方女性史的源头,古希腊人对待女性的态度及其他们的性别观念对后来西方人的女性观念及社会性别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对西方女性史的研究亦如对西方文明史的研究一样,也应当从古希腊开始。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而爱琴文明则是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资料甚少,而有关女性的资料则更少。不过,许多学者认为,在克里特文明中女性的地位要比后来的希腊女性高得多,两性关系的模式是伙伴式的合作关系。至于迈锡尼文明,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在这个时期女性的地位比克里特时代有所下降,但是,在艺术上,那种女性占主导的现象不复存在。

荷马时代是希腊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时期。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了当时贵族、平民、奴隶等不同阶层女性的状况和性别关系。在这个时期,希腊的政治权力掌握在王族手中,家庭和政治、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还不是很严格。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女主内、男主外的性别分工,男性的统治地位也已经初步确立,但是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女性也可以暂时代替他们履行一些原本属于男性的职责。同时,母权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女性的地位较之后来时代要高。荷马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经十分突出,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更多了解到的是以王室为代表的贵族阶级的女性状况,而对下层女性的处境则了解较少。

古风时代是希腊城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世界形成了几百个城邦。这些城邦大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农村而形成的,因此,它们保持着小国寡民的规模。不过,它们却是一个个独立而互不相属的政治单位,是独立的城市国家。随着城邦的形成和发展,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家庭与城邦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希腊社会的性别关系和女性生活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在于,与女性相关的风俗和法律随着城邦的发展而不断走向成熟,并对古典时代的女性观及女性地位产生了影响。女性终生都要在父亲、丈夫、儿子的监护下生活,成为男性的附庸。

在古典时代,随着城邦制度的日趋完善,以男性公民为主体的城邦公共领域与以女性为主体的家庭私人领域的对立格局也逐步形成。于是,女性对公共事务的影响进一步减弱,甚至完全被排除在城邦政治生活之外,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普遍降低。当然,古代希腊城邦繁多,不同城邦的女性状况及人们的性别观念也有所不同。由于我们掌握的相关资料主要是有关古代斯巴达(多利安人的城邦)和雅典(爱奥尼亚人的城邦)的情况,所以我们对古希腊世界女性的考察,主要是以这两个城邦的女性作为代表来进行。

雅典城邦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它既是一个逐渐实现民主制的男性公民集体,也是一个排外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祭祀团体。前者决定了雅典女性被排除在城邦公共生活之外,她们不仅被剥夺了政治和法律权利,而且在婚姻和财产继承上也受人支配;后者则使得在延续家庭和城邦之香火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又被包括在城邦共同体之内,城邦允许她们参与城邦公共宗教活动,并对她们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总体来看,雅典女性屈从于男性的这一现实并未因之而改变。

与雅典的女性相比,古代斯巴达女性享有较多的自由,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较高。在经济上,斯巴达女性享有较大的经济权力,她们能够真正拥有、继承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在教育方面,她们能够像男性一样进行体育锻炼,也会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在政治方面,她们还能对公共政策施以影响。斯巴达女性地位之所以较高,这一方面与斯巴达的财产分割和继承制度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该城邦的军事共同体特征密切相关。前者使得她们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够在家庭和城邦事务中拥有较多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后者则使得城邦将男性致力于保卫疆土和女性致力于生育公民战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弱化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作用,淡化了女性的贞节观念,从而使女性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获得较多的户外活动的自由。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斯巴达妇女仍然屈从于男性统治的现实,不能将她们所享有的较高地位理想化。

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女性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与古典时代相比,她们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权利和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婚姻,还是在受教育方面,希腊化时代的女性所享有的权利都超过了此前的时代。而这一变化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它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女性经济权利的增长、城邦体制的衰弱、古典价值观念的式微和新的哲学伦理观念的兴起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而发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研究的古希腊女性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相当复杂的。首先,不同城邦女性的地位存在着差异。就雅典城邦而言,女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束缚,其地位一步步降低,并最终沦为男性的附庸;而在斯巴达,女性则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和权利。其次,即

便在同一城邦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也有所不同。城邦的上层女公民和下层女公民有所不同,城邦的女公民和外邦女性、女奴亦有所不同,即便是作为社会底层的妓女内部也存在差异。此外,古希腊人的妇女观也是有差异的,具有尊重妇女和歧视妇女两种不同的性别文化传统,但后者在古希腊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一、爱琴文明时代的女性

爱琴文明存在的时间大约从公元前 3000 年—前 1100 年。克里特和迈锡尼先后成为爱琴文明的中心,故该文明又被称作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因为相关的资料极其匮乏,加之克里特时期的文字——线形文字 A 至今未能成功解读,使得我们对爱琴文明时期的妇女生活状况以及当时人们的妇女观了解甚少,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出土的雕像、壁画和遗迹对希腊远古时代女性的社会和生活状况作一粗略的介绍。

1. 克里特社会中的女性

宗教在古代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克里特文明也不例外。克里特所有的艺术手段都深深扎根于无处不在的宗教之中。^① 在克里特的宗教中,女性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对女神的崇拜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女祭司在宗教祭祀中所起的作用上。

女神崇拜是克里特文明的显著特征。在克里特宗教中,女性神祇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大女神是至高无上的,她不仅主宰着自然万物,而且还掌控着社会生活。据说,大女神这一名称的含义可能是“迷宫的女主人”、“迷宫的女王”或“迷宮女神”,双面斧是她的象征。^② 另外一位女神大母神也受到广泛的崇拜。她象征着超凡的生殖能力,保护农业丰产,人丁兴旺。克里特的家神也是一位女神——蛇女神。克里特人认为蛇是友善的,可以保护他们的家宅。鸽女神是丰产女神,同时她也具有家神的特点,可以保护家庭。此外,狩猎女神、树女神等也受到广泛的崇拜。与女神的繁盛相反,在克里特,男性神祇很少,人们崇拜的男神主要是海神波塞冬。

在克里特,女祭司受到人们的尊崇。在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又称“迷宫”)出土的“大看台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成群的男女观众坐在看台上的场景。画面中央的 10 位高

^① 里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第 44 页。

^② Rodney Castleden, *The Knossos Labyrinth*, Routledge, 1990, p. 107.